

鲜英与民主之家

赵东阜 著



鲜英与民主之家

赵东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鲜英与民主之家 / 赵东阜 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3

ISBN 7-80146-998-4

I. 鲜… II. 赵… III. ①人物传记—中国 ②历史人物—鲜英—生平事迹 IV. K8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51836 号

书 名: 鲜英与民主之家

著 者: 赵东阜

责任编辑: 弘 韬

出版书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利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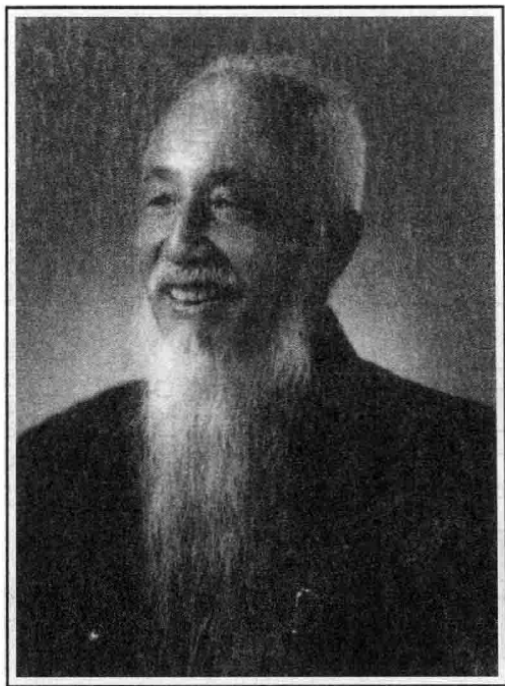
字 数: 157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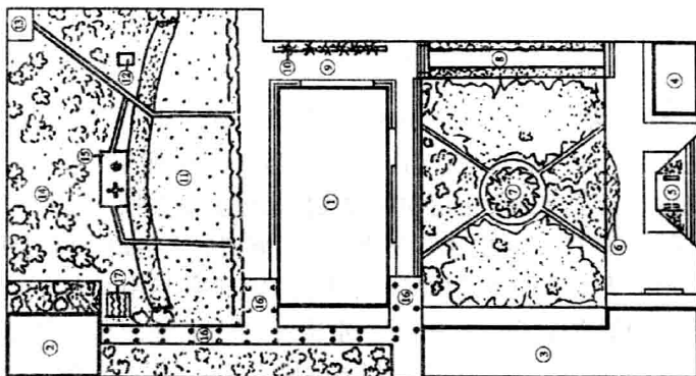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80146-998-4 / K·43

定 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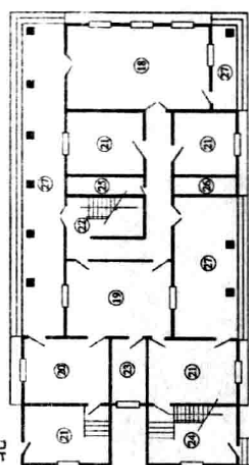


鲜英像（摄于1954年）

鲜 英（1885—1968）是四川旧军人出身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不避艰险，向往光明和真理，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公馆“特园”被誉为“民主之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地，并曾是民盟活动的大本营，也是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次光临特园，在此前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更是特园的常客。鲜英是中共的老朋友。



鲜宅总平面图



正房底层平面图

- | | | |
|---------|----------|----------|
| 1 正房 | 2 书斋小院 | 3 偏房及厨房 |
| 4 传达室 | 5 大门入口 | 6 鱼池 |
| 7 前花园 | 8 夹竹桃甬道 | 9 葡萄架通道 |
| 10 盆栽兰草 | 11 草坪 | 12 防空洞出口 |
| 13 凉亭 | 14 后花园 | 15 葡萄架景点 |
| 16 敞廊 | 17 葡萄架池塘 | 18 客厅 |
| 19 餐厅 | 20 卧室 | 21 卧室 |
| 22 楼梯间 | 23 卫生间 | 24 储藏室 |
| 25 储藏室 | 26 管道夹层 | 25 外廊 |

目 录

第 一 章	出身贫寒	心系民苦国难	1
第 二 章	不避艰险	投身民主运动	33
第 三 章	竭诚尽力	主持民主之家	45
第 四 章	盛情款待	毛泽东三莅特园	69
第 五 章	蔑视迫害	壮大民主力量	102
第 六 章	忠厚侠义	救助民主志士	129
第 七 章	策反杨森	迎接重庆解放	148
第 八 章	以国为家	晚年经历坎坷	166
尾 声	历史归真	再现民主老人	197
后 记			209

第一章

出身贫寒 心系民苦国难

鲜英，字特生，1885年6月10日，生于四川省偏北部的西充县小木井的一个小村庄太平场鲜家沟。追根溯源，鲜家本姓“鲜于”，后祖上化简“鲜于”为“鲜”，故此以后以鲜姓传宗接代。

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充地瘠民贫，学人努力，学风踏实，有“穷不离书”的治家训条世代相传，因而多著书立说之先贤、慷慨悲歌之志士。

鲜家世代务农，生活十分贫苦。鲜父鲜大赐是个贫苦农民，与鲜母养育两男一女3个孩子，夫妇以诚朴忠厚闻名乡里。

鲜家只有少许薄田，终年辛苦劳作，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麦子收获后，常常是将麸皮与面一同搅汤喝。夏天南瓜是重要的食粮。每年只在秋季红苕（地瓜）收获之后才能暂时填饱肚子。红苕叶子和其它杂粮煮在一起，称“鸭脚稀饭”（因红苕叶象鸭蹼）。有时想吃点米饭，就在蒸红苕的锅中放一个碗，碗里仅放一点点米而已。家里有喜事，偶尔吃一顿白米饭，总要给近邻送一点儿。

鲜父临终时说：“我想吃肉。”

可是家里哪有钱买肉呢，就是这样的最后要求也满足不了。但这话却铭刻在鲜英心上。后来不愁吃穿了，他却忘不了以往的贫困岁月，常把贫苦农民的生活讲给孩子们听。

鲜英稍长，族人见他聪颖，凑钱送他到赵家沟赵仪延先生的私塾就读。私塾离家较远，他每日得徒步往返10公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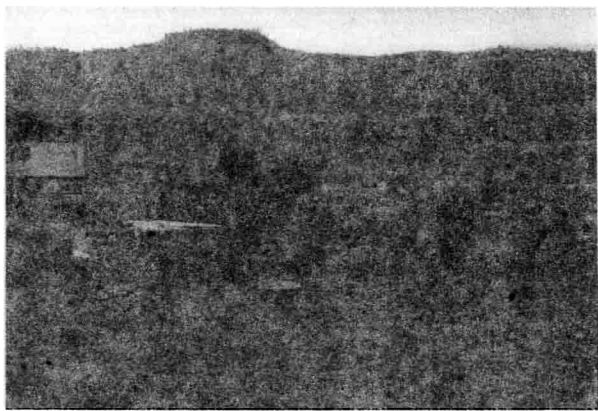


图 1:鲜英故居前的自然环境(摄于 2002 年 10 月)。

中午放学回家，多是祖母为他在灶孔内烤熟红苕以充饥。有时腹内空空，但外人问起时，他总是说吃过了。

由于鲜英幼时长年吃不饱，以致后来形成一种病态，稍一饥饿，头上即冒出很多虚汗，且四肢无力。后来他对子女们说：“这就是幼年时经常忍饥挨饿所致。”他称这是“饿瘠病”。

塾师赵仪延先生为人忠厚和善，看鲜英学习成绩好，对他特别照顾。先生知鲜英家贫，每见鲜英面有饥容时，便说：“锅内尚有菜和稀饭，你去吃了再读书。”

结束私塾学习，鲜英又到西充县鹿岩书院攻读儒家书籍。

一年，天大旱，乡里人家大都揭不开锅了，只得到邻县购买粮食。鲜英的大哥鲜成灿亦随乡人前往购买小麦。几天后，与鲜成灿同行的人回来对鲜英说：“你哥在路上病了，还没回来。”

鲜母得知，吩咐鲜英去接。由于路比较远，不满 10 岁的鲜英涉过一条河，见有人向河边走来，但都不是大哥，此时已是夜色朦胧，饥肠辘辘的鲜英含泪眺望。

这时，只见前方有一个人背着背篋，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鲜英猜想是哥哥，于是抹了一把泪，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哥——”便朝他跑了过去。到跟前一看，果然是大哥。

大哥有气无力地说：“病了，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过不了河。”

鲜英顾不了许多，拉住哥哥的手就往回走，结果发觉哥哥的手滚烫，他“呀”地叫了一声。大哥见他惊讶，就说：“我莫道得了寒老二（当地人这样称伤寒病）？”

哥哥病成这样，兄弟俩只得摸黑赶到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

掌灯时店主叫道：“开饭啦！”

那是当地的一种萝卜饭。西充县土地贫瘠，老百姓都以糠菜杂粮充饥，能有白米掺萝卜的饭可吃，已是相当不错了。

哥俩靠在床板上没去吃，好心的店主找到房里来说：“你两个哪个不吃饭？”看见昏暗的油灯下的两个孩子眼噙泪水不说话，他明白了，随即说道：“吃，先吃，吃了再说。”两个孩子才跟着店主走出房门去吃饭。

第二天临离开客栈时，鲜英把穿在身上的棉背心脱下抵了饭钱。以后鲜英有了自己的稳定收入，曾数次寻找这位善心的小店老板，以报一饭之恩，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鲜英的友人李毅君曾有怀旧诗赠鲜英：

“昔年十一时，
负笈鹿岩居，
遇君衣宽博，
鄙朴且清瘦。
昔年皆幼小，

便知相亲依，
投笔君异志，
十载即出泥。”

李毅君还有一首诗写道：

“同馆客燕京，
呼名夸日弟，
戏拟尊日师，
为说道家旨，
且示释氏书，
真乐穷易得。”

（引自鲜继诚撰写《父亲简历》，未刊稿。）

从这首诗中也可看出鲜英的思想受到了佛教，尤其是道教的影响。因他从少年始即信奉道教，故后来有“鲜老道”、“好好先生”之称。



图 2：鲜英故居（鲜英青少年时代住所，摄于 2002 年 3 月）。

1905年，顺庆府（今南充市）开办官立中学堂，同为西充县人氏的张澜留日归来，在该校任教。这期间，鲜英在该校就读。张澜对鲜英读书刻苦勤奋很是欣赏。除鲜英外，学生中还有朱德、杨森、刘湘、黄隐等后来颇为知名的人士。

1907年，科举废除。鲜英因家贫，已无力就学，适逢当时清政府筹建新军招兵，在成都招考，名为“弁目候补者”。鲜英遂投笔从戎，考入成都弁目学堂。从西充到成都，有300多公里路，鲜英没有路费，只得徒步前往。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对此时已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鲜英来说，投考弁目学堂，主要是因为那里吃饭不要钱，不交学费，这为家里减轻了一大负担。

翌年，因急需军事人才，在弁目队中抽调一批优秀者参加速成学校加以培养。为此，成立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并聘请日本教官指导训练，主其事者为教育长朱庆澜。鲜英升入该学堂，与刘湘、杨森、王缙绪、潘文华、唐式遵、贺国光等四川军人为同窗好友，并与杨森在同一宿舍睡上下铺，与刘湘特别要好。

鲜英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成都凤凰山新军军营服役，任下级军官。在此期间，鲜英加入了保路同志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参加了反正起义。

贫苦家庭的养育，新式学校的学习和张澜的影响，使得鲜英的思想开明，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倾向。在这一时期，鲜英对自己个人生活的处理，很能说明这一点。

鲜英在入军事学堂前，已娶妻何氏在家。入学一年多以后回乡探亲，发现妻子已有身孕。按当时族规，妻子不守妇道，是要被休的。在那偏僻的山村，被休的妇人很难生活下去，很可能寻短见。鉴于此，鲜英对妻子说：“你就在家，孩子生下来算我的，以遮人耳目，以后设法带着孩子去找你的相好。”

鲜英后来生活宽裕,与再婚的妻子商量好,每逢年节都给早已离异的前妻寄些钱。

鲜英再婚的妻子名金竹生。婚后,鲜英立即劝其终止缠足,并细述缠足的坏处。不仅如此,他还劝说岳母不要再让两个姨妹缠足。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谓十分难得。因此,后来鲜英夫人的大妹妹是“半大脚”,二妹妹是天足。



图3:鲜英故居(鲜英青年时代住所,鲜英长子、次子在此房内出生。照片中门坎内站立者为鲜继康,坐门坎上系围巾者为鲜继根。摄于2002年3月)。

1912年1月,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驻节南充,委鲜英为宣慰使卫队队长(相当于团长),辖两个营,杨森、刘湘均在队内供职(一说杨任营长,刘任差遣)。(★据鲜继诚撰写的《父亲简历》记载:“1911年冬,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驻节南充,带一个护卫营回川北一带巡视,由杨森任营长、刘湘任副营长,鲜英任参谋。)。张澜比鲜大13岁,两人志趣投合,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南充距鲜英家乡西充百十里,鲜英时常回故里省亲。他购

置了温度表和湿度计等物，要哥哥广种桑树，大量养蚕，以增加生活的经济来源。

1913年，鲜英28岁。这时，他在军中初露头角。朱庆澜在广东任职期间，鲜英在广东军队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为时很短。继由朱庆澜在黑龙江督军任内，保荐鲜英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再度与贺国光同学，并结识了徐永昌、周亚卫、姚琮等人。当时陆军大学的教育长是李济深，该期同学中日后知名的有张作霖的奉军参谋长杨宇霆，浙系军事学者周亚卫，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宪兵司令部部长贺国光等，还有姚琮、赵冀仓、邱月曦、罗仪三等人。

鲜英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留任袁世凯总统府侍卫官。

后来，鲜英见袁世凯醉心帝制，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便毅然借故离职，南下广州，参加“护国战争”讨袁。袁氏倒台后，他痛恨北洋军阀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愤而回川，在川军刘湘部钟体道任师长的61师任参谋长。

四川地方军队形成了两大派系，即保定系与速成系。速成系的首领如刘湘与杨森等都是鲜英的同学和同事。鲜英对杨森的评价是奸狡成性，阴险恶毒。对刘湘的印象则是处事忠厚，待人以诚。因此他一直在刘湘部任职，直到刘湘病故。

1920年，川军与驻川滇军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形成以唐继尧为首的“倒熊同盟”和以熊克武为首的“驱滇运动”的对立。此时，刘湘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率三旅之众，驻防合川、永川一带，在双方之间何去何从，举棋难定。

刘湘特约鲜英一同商议，鲜英详细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应该顺应全川的人心所向，“拥熊送客”，即赶走唐继尧的部队。

不久战起，刘湘与熊军共同行动，战事失利，败退保宁（阆中）。刘湘整顿部队，任鲜英为第二师参谋长。5月，熊克武委刘

鲜英与民主之家·赵东阜 著

湘为第二军军长兼北路总司令。7月,刘湘率部与熊克武部队配合反攻,刘任前敌各军总指挥,向南推进,先后攻克成都与重庆,使唐继尧部队溃退云南。

“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在北京致函鲜英,嘱其在重庆办报。1920年,鲜英与叶秉诚、袁彬、罗纬等人为了将新思想、新文化潮流引向四川,决定创办《新蜀报》。他聘“少年中国学会”的陈愚生为社长,仿《晨报》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1921年2月1日,《新蜀报》在重庆创刊,大力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先后聘请了恽代英、肖楚女、陈毅和漆南薰等主持笔政,杨闇公、张闻天、吴玉章等也应鲜英之邀撰文。这些人后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他们宣传先进理论,同时也启发了鲜英与时代共进的思想。这一报纸在西南地区思想领域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每当报社经费发生困难时,张澜与鲜英等都给予大力支持。《新蜀报》在重庆是一家创办最早、牌子最老的地方性报纸。

1921年,刘湘在重庆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鲜英任总司令部的行营参谋长,并兼任重庆铜元局局长(后为四川造币厂厂长)。

1922年,鲜英任刘湘驻汉口的代表,不久因身体欠佳,举家由重庆迁往杭州、宜昌和北京等地休养,这期间未进行任何从政或经商的活动。在杭州时,鲜英租屋于玉泉寺后院,此时全家共6口,儿女分别是鲜继诚、鲜继明、鲜继恒、鲜继桢。后转迁宜昌,本打算返回重庆,适逢大病初愈,又值秋季来临,所以迁往北京休养。当年冬,五子继坚出生,直到1925年春,全家才返回重庆。

当年秋,鲜英代表刘湘去北京与段祺瑞洽商有关事宜,任务完成后,于冬季返回重庆。

1924年,吴佩孚为了控制川局,大力扶持杨森。1925年

4月，杨森发动“统一之战”，欲以武力统一全川。刘湘深悉鲜英与杨部主力、第一师师长王缙绪有同乡兼同学的双重关系，暗中派鲜英去王缙绪处，劝其“息兵停战，以纾民困”。王接受鲜英劝说，发出通电斥责杨森。

杨部其他师旅长迅速响应王的通电，战局急转直下，杨森大败。刘湘接收了杨森的大部分部队。9月，刘湘委鲜英为师长，接任原杨部第10师师长何金鳌的职务，并兼江（北）巴（县）卫戍总司令，驻防重庆。

这时，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四川军阀见机行事，纷纷易帜，刘湘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鲜英任该军第10师师长。

1927年，在刘湘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不久，“顺泸起义”爆发，四川各路军阀联合进攻泸州起义军。刘湘于5月令鲜英率全师协同赖心辉、刘文辉等部围攻刘伯承（即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泸州起义军的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澤部。鲜英师当时承担的是包围泸州西北面的龙头关一线的任务。鲜英对起义军采取了“明攻暗联”的策略，在进行了一次战斗后，基本上按兵不动。5月16日，待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等人出龙头关，从鲜英所率第10师的阵地左翼向东突围脱险后，始率部进驻泸州城。

鲜英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显然在旧军阀的营垒里面，他与他的“同胞”在政治上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他是旧中国统治阶层中那种极少的正直爱民、洁身自好的人。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同情民众的苦难、同情正义的革命事业，对旧军队、旧政权的黑暗与腐败，他在内心是痛恨的。事实上，他从未将自己全身心地融入旧军队和旧的政治势力。可以说，贫苦的出身、儒家的修身道理，道家与佛家善行的诱导，加之早年与共产党人的接触，特

鲜英与民主之家·赵东阜 著

别是受到张澜的影响,使他很容易与反动的旧势力决裂,并义无反顾的投入人民革命的阵营。

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整编部队,鲜英辞去师长职务,改任刘湘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参赞(相当于顾问)。9月,刘湘令鲜英等人接收从事军工生产的重庆惠民机器厂,与重庆铜元局合并改组为重庆制造厂,任命鲜英为重庆制造厂厂长。

1929年和1930年,刘湘的军部下令划拨鲜英地皮以付清对他在师长任内的旧欠(没有发现有关资料说明所拨地皮位居何处,但经分析可以确定,此处地皮即为后来特园的所在地——作者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外侮频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一筹莫展,而两广的反蒋声势高涨。两广之中,尤以广西的“桂系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最有声势。他们搞地方自治,以“寓兵于团”、“寓将于学”为名,同南京政府唱对台戏。这一情况,对于国内其他的地方实力派来说,显然是件大好事。蒋介石独裁的权力受到制约甚至受到打击,就会使其难以投入更多的力量“收拾”其他的地方实力派。

1933年春,鲜英受刘湘委托,同张澜出川“考察”。名为“四川教育、实业、地方自治考察团”,实则联系宁、沪、粤、桂等地的抗日反蒋势力,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刘湘在四川军阀中是依靠蒋介石援助起家的,但他对蒋排斥异己、吞并地方势力的企图十分警惕。自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苏区后,蒋多次借口川军“剿共”不力,要派中央军入川,更引起刘的疑虑,唯恐蒋对其吞并。同时,在全国一片反蒋声浪中,刘对蒋的政治前途也开始怀疑,十分希望与各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系,互通声气。由于两广反蒋声势最大,刘更希望打通与他们的联系渠道。

鲜英与刘湘相知相交的渊源很深，而且二人志趣相投，因此，鲜英深得刘湘的信任和倚重。鲜英思想开明，与军界人士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多有交往，人缘极好。最初，刘湘打算派鲜英为代表出川联系地方实力派，但鲜英以为，自己是军人身份，出川一事颇易引起外界猜疑，与各界联系殊多不便，莫如推举一位声望卓著的川省民主人士率团出川考察更为有利。

恰于此时，张澜避难来渝，下榻鲜宅，正欲出川联系各界民主人士，共谋反蒋救国大计。于是鲜英便向刘湘积极推荐，要刘派张澜为川省代表到外省考察，得到刘湘的赞同。遂有组织代表团之议。

刘湘私下对鲜英说：“你同表老（张澜字表方，因年纪大和德高望众，人尊称之“表老”）一道去很好，会着两广方面有关系的人，请你务必代表我好好向他们致以敬意。”

张澜得知鲜英的建议后认为，值此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当不计个人得失，为谋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因而态度十分积极。

刘湘除指派鲜英为代表协助张澜外，代表团的3名随员都由张澜指定。3名随员中杨达璋负责料理张澜生活，兼负责考察工业建设方面；任乃强管对外报道，兼负责考察教育、农业方面；杜象谷为秘书，负责政治方面的考察。3名随员皆是张澜的学生，彼此了解，各有所长。故整个考察团亲密无间，凡各有活动互相通报。

为避免蒋介石的猜疑，刘湘还要鲜英带上他的密码本，规定了他们在考察中与刘湘的联络方法。他们考察的主要目的地是两广，两广中的重点是广西。

4月17日，张澜、鲜英一行人顺江而下，21日抵汉口，参观武汉大学，然后访问农业部商品检验局，了解桐油集散及出口有关问题，以作川省发展桐油生产的参考。